

第一部〈战后东亚的国际关系与档案〉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与福田外交

井上正也（成蹊大学）

本报告旨在利用新史料来重新探讨 1978 年 8 月签订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下略称“日中条约”）的缔约谈判。关于日中条约，先行研究将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日中两国围绕反霸权条款（包括第三国条款）的谈判过程。关于中国为什么改变在反霸权条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而转为推进缔约的原因，一般归结为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 1977 年 7 月邓小平政治地位的恢复。但是，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当时福田赳夫政权在考虑其它外交谈判以及国内政局的同时，是如何考虑日中条约谈判问题的，却很少论及。为什么在中国方面改变态度后，到日中条约缔结还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前的先行研究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回答。

本报告主要着眼于福田赳夫政权推进日中条约谈判时所重视的以下两点，以图在日本政治外交史的脉络中重新梳理日中条约的缔约谈判。

第一，日苏谈判与日中谈判间的平衡问题。正如福田任命鸠山一郎原首相的长男鸠山威一郎为外相时所表明的，他很重视对苏关系的发展。因此，日中条约谈判也是在考虑日苏渔业谈判的进展情况下被推进的。福田的外交理念是将日本的外交基础扩大到共产圈的所谓“全方位和平外交”，外务省摸索的是与苏联以及与中国关系可以齐头并进的外交局面，这与福田的理念基本吻合。本报告利用新公开的外务省档案，阐明了福田首相与外务省干部在推进对中国谈判之际是如何考虑苏联因素的。

第二，国内政治（政局）与外交的相互关联性问题。福田政权在日中条约谈判过程中考虑最多的是自民党内的动向。由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实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对福田来说，那是一种苦涩的记忆。福田虽然在开辟了日中关系的新道路这点上赞成邦交正常化，但同时也认为那是没有取得党内共识的拙劣外交，由此引起自民党内的对立更加深刻。本报告发现，与 1972 年的日中谈判形成鲜明对比，福田非常重视自民党内一致意见的形成，对推进条约的文本谈判时非常慎重。同时，本报告还着眼于福田首相的领导问题，阐明福田是如何抑制条约积极派的园田直外相擅自主张，并在取得国内共识的基础之上才推进日中条约缔结的。

本报告除了利用了先行研究所使用的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和会谈记录，还利用了实行情报公开法后而解密的外务省档案以及坊秀男日记等私人文件，来阐明福田政权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战略。



中朝关系的新起点：劳动党八月事件及其结果——基于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的研究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

1950 年中国出兵朝鲜，是中朝关系在当代历史上的起点。但与人们通常理解的不同，实际上，中朝关系在朝鲜战争期间十分紧张。战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国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双方关系依然异常冷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56 年。

1956 年朝鲜劳动党内部斗争激化，发生了金日成镇压反对派的八月事件。中国一开始置身事外，直到大量反对派干部（以延安派为主）逃亡中国，才引发了毛泽东的震怒。中共和苏共一起采取了干涉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迫使金日成承认错误的方针。中苏最初的立场是帮助金日成改正错误，消除因此而引发的朝鲜劳动党内部危机，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阵脚。

金日成阳奉阴违的态度令毛泽东十分不满，1956 年底，中共有意采取强硬措施，像苏联解决匈牙利危机一样处理朝鲜问题，并为此征求苏共的意见。由于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再加上金日成趁苏联和中国忙于处理波匈事件之机，再次对党内进行清洗，反对派干部全部被铲除，中国已无法直接干预朝鲜事务。1957 年春天，中

国开始转变对朝鲜的方针。一方面批判在对外工作中“大国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一方面加大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金日成见面，主动承认中国干预朝鲜内政的错误，并提出让驻朝志愿军40万人全部撤回回国，又派彭德怀去当面向金日成道歉。

1958年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对金日成在朝鲜的实现绝对独裁的统治予以承认和支持，金日成则在朝鲜开始全面学习中国，从而开启了中朝关系的新篇章。此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中朝关系的确显示出一种特殊性，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古代中央“上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宗藩关系，或可称之为蒙着革命色彩的最后的“天朝”。

第一部评论

下斗米伸夫（法政大学）

期待已久的畏友沈志华的大作《最后的“天朝”》完稿，并已由朱建荣译成日语出版（岩波书店），笔者对此感到不胜欣喜。

此书尤其值得圈点之处，是它就1956年震惊中朝乃至莫斯科的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给出了全新解释，堪称新的标准解读。其原因在于，沈著对毛泽东策划扳倒金日成这一通俗说法，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机密史料加以反驳、纠正。仅史料一端，已令人耳目一新。这诚可谓沈氏孜孜求索国内外档案的辛劳成果。

自1956年8~9月该事件发生，至1958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其间的中朝关系，同样也是开始于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关系的危机。从地理位置上看，北朝鲜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其政治危机乃是关系到中苏安全保障与意识形态的问题。纵非如此，等级关系与危机管理本就是同盟的关键之处。

1945年8月日苏战争爆发，苏联红军25军原定在朝鲜与日军正面交锋，未料战争结束早于预想，苏联占领了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亟需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其时在莫斯科负责应付占领地事务的斯蒂科夫大将（大使，日丹诺夫之婿）等人创设了执政党，即劳动党。日语翻译科维仁科（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выженко，于东京任职后，就任苏共日本科长）等所在的第七科又将驻哈巴罗夫斯克苏军翻译金日成（金圣树）推为新的领导人。

在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先后领导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等同盟国对策事务实质上由日丹诺夫、米高扬负责，1957年起则由安德罗波夫接管。20世纪40年代末，有关中苏是否承认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虽有争议，但直到毛泽东、金日成出席1957年11月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为止，中苏在亚洲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是，苏联负责战略问题，亚洲战术指导部则设在北京。对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也包括在内。

中苏、中朝关系亦在这一框架之中。以笔者拙见，1955年乃是亚洲冷战的重要转折点。同年4月末，金日成以南下统一之方针，携将北朝鲜作为“社会主义根据地”的劳动党新纲领案，秘密访问莫斯科。然而持和平共存论的苏联非但否定了该提案，更批判金搞“个人崇拜”，要求朝鲜比照苏联的集团领导，划分党与政府的权限。金一面回应称未来将推举崔庸健为首相，一面却在12月借文艺政策，批判掌控党内组织的亲苏派，鼓吹“我们式”主体思想。对此，亲中派亦表支持。

1956年，崔出席了苏联共产党大会，之后勃列日涅夫亦出席了第三次劳动党大会。然而，至八月事件发生为止，亲中派党员开始批判金日成“个人崇拜”，在推翻金的谋划中发挥核心作用。如此看来，亲中派党员是在知会苏联大使馆后开始行动的，与中国的意向并无关系。

另一方面，结合1955年末苏联的动向来看，便可知苏联对这一行动未必持欢迎态度。前文曾提及的科维仁科与米高扬、彭德怀同入平壤（亦因如此，他当时并未触及日苏和平条约交涉），在他看来金日成的党内权力已

